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Albrecht Wellmer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著

钦文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38646

B15
26
2013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著
钦文译



B15
26
2013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北航

C1726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德)维尔默(Wellmer, A.)著;钦文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13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9556-3

I. ①论… II. ①维…②钦… III. ①阿多诺, T.W.
(1903~1969)—理性主义—研究 IV. ①B089②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8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著

钦文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56-3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26.00 元

Albrecht Wellmer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990

根据苏尔坎普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德文版前言	3
真实、表象、和解——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审美拯救	5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 批判	50
艺术和工业生产——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126
阿多诺——“非同一的特殊事物”的维护者	149

中文版前言

自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在欧美被称为一场智性的潮流，它宣告了与现代性的诀别，标示着进入了后—现代时代，同时它也在倡导着某种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一种充满歧义和矛盾的概念，在本书的同名文章以及《艺术和工业生产》一文中我试图分析这个概念，并解开这个疑团。后现代可以理解为对启蒙和理性极端的批判，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批判的自我超越。现代性中包含着片面的理性主义，对进步的信念，以及历史哲学的宏大建构（诸如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和政治理论等诸多领域，后现代有着各不相同的内涵，我正是要解开这些疑团。另一方面，时下对后现代有着某些反动，非理性的理解，我要做的是与之针锋相对，建立极端化的启蒙思想，自我批判的现代性，使某些“好”的后现代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也试图继承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传统，我自己就是在这一传统中成长的。但是以某种积极的方式，对现代性的许多“自我批判”已经包含在了后期的批判理论中了，尤其是在阿多诺身上，后者或许是其中最积极的代言人。我写了两篇有关阿多诺的文章，一篇是关于他的美学思想，另一篇是关于他的整个哲学规划，这两篇文章都收入了本书。虽然这两篇文章有一定

2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的批判性,尤其是关于阿多诺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残余,但是我还是试图清楚地表明我们十分感谢阿多诺,并且超越“现存”的现代性做批判性的思考。此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我在文章中提到了于尔根·哈贝马斯,他曾是我的老师。他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划做出了全新的表述,这一思想在多方面给了我启迪,促使我与那些误入歧途的后现代倒退倾向做抗争,从而使已经极端化的启蒙理念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最后要提及的是,除了批判理论的传统外,多年以来,我一直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这在我的思考中也留下了某种印记。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给中国的读者某种印象,让他们知道在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中,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做了些什么。

德文版前言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几篇文章原是演讲稿,分别出于不同的原因。《真实、表象、和解——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审美拯救》是1983年9月在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学术研讨会有关《美学理论》的分组讨论上提交的论文。《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的初稿是一篇演讲稿,是在巴黎人文科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现代和后现代”学术会议上的演讲。《艺术和工业生产——论现代和后现代辩证法》是一篇讲稿的扩充和改定稿,这是1982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为了纪念德国工厂联合会成立75周年。《阿多诺——“非同一的特殊事物”的维护者》是1984年7月在康斯坦茨大学做的一次演讲,本来不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篇演讲中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前两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我之所以决定将这篇演讲稿付印,是因为各种想法(尤其是关于阿多诺的哲学)在这篇演讲中更加完整地诠释了出来,而在余下的几篇讲稿中只是以极其压缩的形式表达出来。

本书中这四篇论文在主题上的关联在于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理性形式进行抗辩的过程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同时也试图通过这几篇文章和阿多诺一起(也针对阿多诺)从错误的“用和解哲学对抗非理性主义”的替代方案中提炼出理性

4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主义批判。

在这里,我要感谢德国学术研究联合会,正是由于它的鼎力相助才使我有了一个学期的科研假,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可能性。

真实、表象、和解

——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审美拯救

没有一个人像阿多诺那样如此全面地测量了文化现代性的所有歧义,在这些歧义之中预示着多种可能性:审美和交往潜能的爆发,文化的死亡。也可以做这样的猜测:自叔本华和尼采之后,没有哪一种艺术哲学(至少在德国)能够像阿多诺的艺术哲学那样对艺术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其实,阿多诺私下里一直与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和认识论进行沟通。这种影响的印记是无法忽视的,它存在于现代艺术的创作、批评或者(只是)接受之中。其中产生影响最深的领域莫过于音乐批评了,正如卡尔·达尔豪斯*所说的那样,直到阿多诺才“确定了一个水准,只有在这个水准上才配得上谈新音乐”¹。虽然阿多诺为音乐所圈定的界限已经被新的音乐所超越,但是在新近的音乐批评中仍然能够感觉到阿多诺的权威。我想起了 H. - K. 梅茨格为约翰·凯奇**的“反权威”音乐所作的辩护。² 阿多诺的思考方式,即他的才智反应

* 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德国音乐理论家,主要研究音乐美学及19世纪音乐史。——译者

**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美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是现代音乐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6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方式似乎已经在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沉淀了下来。而与此相对,他的《美学理论》在艺术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圈子里运气就稍差一些了。经历了一个十年的批评接受时期之后,阿多诺的美学似乎只留下了一些碎片和废墟,还零星地存在于哲学、文学和音乐批评之中。并非是《美学理论》的深奥,而是其所具有的系统性成为了人们接受它的障碍。否定性美学有着其一成不变的特征,阿多诺的布满难题的思想体系显示出某种艺术性,而他的审美判断则使某种隐秘的传统主义突现了出来。就像哲学中司空见惯的一样,只要理论家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就在自己人中间瓜分猎物。否定性、表象和乌托邦(阿多诺认为这就是艺术所表现的东西)之间的复杂关联只是散见于耀斯的接受美学、比格尔的文学社会学或伯勒尔的突发性美学之中。从对阿多诺的哲学批判,尤其是鲍迈斯特、库伦坎普夫、布伯纳等人针对阿多诺的美学体系提出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阿多诺折衷主义倾向的结果。³在我看来,这里提到的所有批评家都有道理,至少部分有道理,这一点无可辩驳。但他们的批评给人留下一种比例失调的感觉:批评的结果和批评的对象之间的比例失调,阿多诺美学的核心所在似乎被批评家们忽略了。这种批评只抓住问题的局部,而不是放眼全局,这也正是危险所在。而在阿多诺的美学中却可以避免这一危险,前提是我们能够成功地使其美学的核心范畴从内部运动起来,并且将这些范畴从其辩证的一成不变中释放出来。前提并不是要减轻批判,而是要集中批判的火力。我将尝试着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一步。

理解阿多诺美学的关键文本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这本书中,主观化和具体化的辩证法已经得到发展,并且多少显露出了审美表象的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的相互渗透就是《美学理论》的运动原则。谈到《启蒙辩证法》,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不仅源自其高度浓缩,使人豁然开朗的书写风格,更多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它的勇于尝试,即试图将相互矛盾的两种哲学传统糅合在一起:一种是从尼采直到克拉格斯*的承传⁴,另一种则是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一直延续到早期卢卡奇的传统。^{4a}卢卡奇就曾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融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人们可以把《启蒙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将克拉格斯的对文明和理性的极端批判接受下来。这样一来,从自然魔力中解放出来的各个阶段以及相应的阶级统治的各个阶段(马克思)都可以被理解为主观化和具体化之间辩证关系(克拉格斯)的各个发展阶段。在这里不得不对认识论上的三叠纪(主体、客体和概念)做一番重新解释,将其理解为一种压迫和征服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受压迫的主体同时也就成为了被征服的牺牲品。在人内在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冲破秩序的幸福冲动,而压制这一本性就是在塑造统一体自我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代价,但为了

* 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认为人类原本的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被后天获得的智力打破了。——译者

8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自持和控制外在的局面,这又是必要的。就本质而言,主体就是作为一种自持意志而存在的,为了使主体能够安排和控制现实,概念就是一种“理想的工具”,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尼采甚至是叔本华。因此,形式逻辑并非推导真实的工具,在主体统一体(“促成秩序的自我原则”,《否》第36页)和担负着“预备”和“切断”(《否》第21页)作用的概念之间,形式逻辑只是某个中介环节。构成秩序的精神抽象地使其他事物变成客体,并且根据非矛盾的原则行事,这种精神在其初始阶段(即“将生命划分为精神和物质”,参见《启》第279页)就变成了某种工具化理性。这种工具精神本是活生生的本性的一部分,但它最终甚至有可能将自己转变为死板的概念。究其根源,担负着客体化任务的工具精神便忘却了自我,忘却自我便导致将自我独立出去,盲目地将自己装点为万能的工具理性。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当然严守马克思(同时也是黑格尔)的立场,将文明的进程同时视作启蒙的进程,而“和解”,“幸福”或者“解放”只能是这一进程的结果(参见《启》第80页)。于是通往克拉格斯充满混乱的图像王国的归路被切断了,这是一条虚幻的通往和解之路。我们可以将和解理解为对本性自我纷争的扬弃,要想达到和解,人类就要在劳作、牺牲和放弃的历史中完成对自身的建构(参见《启》第71页)。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启蒙进程只能凭借自身的手段,即控制本性的精神来超越并实现自我。启蒙对自身的启蒙,“铭记主体中的本性”只有通过概念这一手段才有可能实现。当然前提条件是,概念必须转向具体化的概念性思考,正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假定的那样:哲学是“通过概念从而超越概念的努力”。(《否》第27页)